

余秋雨

旅苦化文

爾雅出版社印行



余秋雨著
文化苦旅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曾堯生

文化苦旅 (爾雅叢書之270)

作者：余秋雨

校對：吳美幸·沈美蓉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

廈門街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三六五四〇三六 電傳：三六五七〇四七
郭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一〇五號九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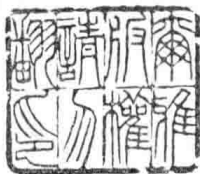
印刷者：達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吳鳳路五十巷四十二弄二十六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民國八十三年元月一日八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 280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639-083-4

爾雅出版社特別推薦

余秋雨，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也是白先勇最推崇的大陸當代學人。他寫得

一手好散文，「文化苦旅」就是一本最令人動容的散文集，透過中國大陸

的自然景物，寫這一代中國人心靈中的糾結，是一本有關中國美學的書，

深入淺出，你從來不曾想到，中國深沉的文化，可以用這樣漂亮乾淨的白

話文表達出來！

自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寫過一些史論專著，記得曾有幾位記者在報紙上說我寫書寫得輕鬆瀟灑，其實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種很給自己過不去的勞累活，一提筆就感覺到年歲陡增。不管是春溫秋肅，還是大喜悅大悲憤，最後總得要閉一閉眼睛，平一平心跳，回歸於歷史的冷漠，理性的嚴峻。由此，筆下也就一派端肅板正，致使海內外不少讀者一直認為我是一個白髮老人。

我想，任何一個真實的文明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心理上過著多種年齡相重疊的生活，沒有這種重疊，生命就會失去彈性，很容易風乾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齡經常會在心頭打架，有時還會把自己弄得挺

苦惱。例如連續幾個月埋首於磚塊般的典籍中之後，從小就習慣於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默默地反抗，隨之而來，滿心滿眼滿耳都會突湧起向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這是不同於案頭年齡的另一種年齡在搗亂了。助長這種搗亂的外部誘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 Richard Schechner 比我大二十多歲，卻冒險般地遊歷了我國西南許多數民族地區，回到上海仍毫無倦色，逛城隍廟時竟像頑童一樣在人羣中騎車而雙手脫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給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與剛滿八歲的小兒子合著的，父子倆以北冰洋的企鵝為話題，癡癡地編著一個又一個不著邊際的童話。我把這本書插在他那厚厚一疊名揚國際的學術著作中間，端詳良久，不能不開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鑽研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耳邊也會響起一批大詩人、大學者放達的腳步聲，蘇東坡曾把這種放達稱之為「老夫聊發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牽獵狗，左手托蒼鷹，一任歡快的馬蹄縱情奔馳。其實細說起來，他自稱「老夫」那年才三十七歲，因此他是同時在享受著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過得顛顛倒倒又有滋味。

我們這些人，爲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爲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爲了什麼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這種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沒有人能告訴我，我悄悄出發了。

當然不會去找旅行社，那種揚旗排隊的旅遊隊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單身孤旅，但眼下在我們這兒還難於實行：李白的輕舟、陸游的毛驢都僱不到了，我無法穿越那種似現代又非現代、由擁塞懈怠白眼敲詐所連結成的層巒疊嶂。最方便的當然是參加各地永遠在輪流召開著的種種「研討會」，因爲這種會議的基本性質是在爲少數人提供揚名機會的同時爲多數人提供公費旅遊，可惜這種旅遊又都因

嘈雜而無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講課的邀請不少，原先總以為講課只是重複早已完成的思維，能少則少，外出講課又太耗費時日，一概婉拒了，這時便想，何不利用講課來遊歷呢？有了接待單位，許多惱人的麻煩事也就由別人幫著解決了，又不存在研討會旅遊的煩囂。於是理出那些邀請書，打開地圖，開始研究路線。我暗笑自己將成爲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

就這樣，我一路講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實在不少。旅途中的經歷感受，無法細說，總之到了甘肅的一個旅舍裏，我已覺得非寫一點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薰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常常像傻瓜一樣木然佇立著，一會兒滿腦章句，一會兒滿腦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裏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

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捲，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佇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沌地交融在一起了，於是有了寫文章的衝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劃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遊，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擔，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又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座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

且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後只得像《金色池塘》裏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煙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後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字上塗塗抹抹，然後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穫》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面。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像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說大一點，決定著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事實上，即便是在一種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尋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們又何必把這種定位看成天生血緣呢？

啊，故鄉，故鄉是什麼，所有的故鄉都從異鄉演變而來，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

王鼎鈞：《左心房漩渦》

我拋棄了所有的憂傷與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那永恆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沿著這條路走來。

泰戈爾：《採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程，那麼，每一次留駐都不會否定新的出發。基於此，我的筆下也出現了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評述。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於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禱，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後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鬆、蒼老後的年輕。

當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

文化苦旅

余英时

自序

道士塔

莫高窟

陽關雪

沙原隱泉

柳侯祠

白蓮洞

都江堰

三峽

六九

五九

四九

三九

三三

二五

一三

一

洞庭一角

八一

廬山

九三

貴池儻

一〇七

青雲譜隨想

一一九

白髮蘇州

一三一

江南小鎮

一四一

寂寞天柱山

一六五

風雨天一閣

一八一

西湖夢

二〇三

狼山腳下

二一九

上海人

二三一

五城記

二六一

牌坊

二七五

廟宇

二八七

夜航船

三〇一

吳江船

三一三

信客

三二五

酒公墓

三三七

老屋窗口

三四九

廢墟

三六一

夜雨詩意

三六九

筆墨祭

三七九

藏書憂

四〇一

臘梅

四一三

家住龍華

四二一

三十年的重量

四三一

漂泊者們

四四三

華語情結

四六七

這裏真安靜

四九三

後記

五一一

道士塔

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從幾座坍塌的來看，塔心豎一木樁，四周以黃泥塑成，基座壘以青磚。歷來住持莫高窟的僧侶都不富裕，從這裏也可找見證明。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羣更顯得悲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籙！

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裏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卷，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洩。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洩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齣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啓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豔的晚霞。那裏，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